

古典诗词名家

韩愈 柳宗元诗选

孟二冬

选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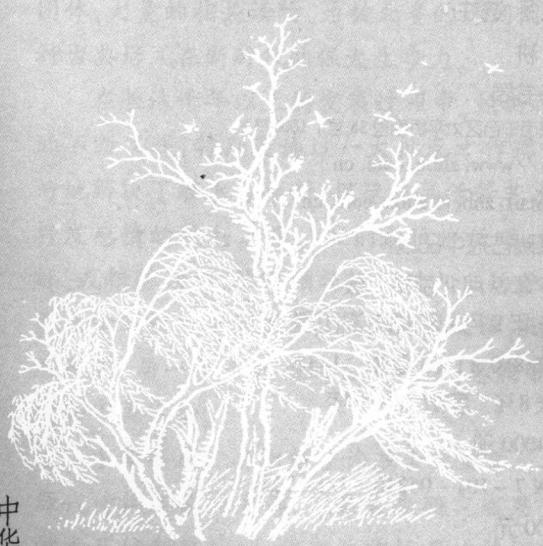


韩愈 柳宗元诗选

孟二冬

选注

古典诗词名家



中华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韩愈柳宗元诗选/孟二冬选注. —北京:中华书局,
2006

(古典诗词名家)

ISBN 7 - 101 - 05240 - 1

I . 韩… II . 孟… III . 唐诗 - 选集 IV . I222.7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91051 号

书 名 韩愈柳宗元诗选

丛 书 名 古典诗词名家

编 著 者 孟二冬 选注

责任 编辑 张 耕

出版 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 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

版 次 2006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2006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张 8 1/8 字数 180 千字

印 数 1 - 4000 册

国际书号 ISBN 7 - 101 - 05240 - 1/I · 727

定 价 16.00 元

感受汉语魅力
培育优雅气质

分享至美意境
体验诗情人生



《古典诗词名家》丛书

1. 诗经选译
2. 楚辞选译
3. 两汉诗选
4. 三曹诗选
5. 陶渊明诗选
6. 谢灵运 鲍照诗选
7. 谢朓 庾信诗选
8. 王维 孟浩然诗选
9. 高适 岑参诗选
10. 李白诗选
11. 杜甫诗选
12. 白居易诗选
13. 韩愈 柳宗元诗选
14. 韦应物诗选
15. 李贺诗选
16. 李商隐诗选
17. 杜牧诗选
18. 柳永词选
19. 欧阳修诗词选
20. 贺铸词选
21. 苏轼诗词选
22. 黄庭坚诗词选
23. 秦观词选
24. 周邦彦词选
25. 李清照诗词选
26. 辛弃疾词选
27. 陆游诗词选
28. 元好问诗词选
29. 高启诗选
30. 钱谦益诗选
31. 龚自珍诗词选



出版说明

诗词是中国古典文学传统最深厚、最具魅力的形式之一，由于它充分体现了汉语的特点，兼具文学性与音乐性两大艺术特质，以简约的形式蕴涵了丰厚的韵味，所以一直受到作者与读者的青睐，其社会参与的广泛程度是其他形式难以比拟的。时至今日，诗词在海内外仍拥有大批爱好者：自发成立的众多业余创作团体，大量的相关读物，为数众多的诗词网站，无一不在昭示着这种古典形式在新时代的强大生命力。

在长达千年以上的发展过程中，经由社会各阶层无数爱好者的不断实践，特别是通过一大批天才作家示范性的工作，诗词较好地解决了继承与革新、规范与灵活等艺术矛盾，成为表达思想、抒发感情的便利工具。人们或浅吟低唱，或慷慨高歌；或率尔操觚，或精雕细刻，尽情倾吐他们对人世的种种感受，留下用心血甚至生命写就的诗词篇章。诵读这些篇章，犹如穿越时空的隧道，步入历史，与一个个鲜活的生命对话，总能带给我们丰富的人生感受和审美体验。

中华书局过去出版了许多古代文学作品的总集、别集。精选历代诗词名家的名作，汇聚最新研究成果，为社会提供一套兼具学术品位和可读性、雅俗共赏的系统诗词选本，一直是我们的夙愿。为了达成这个愿望，我们特意邀约了全国二十多家单位的三

2 韩愈柳宗元诗选

十多名专家学者，编撰了这套“古典诗词名家”丛书。我们的做法是：一、以传诵程度作为作品入选的首要标准，同时兼顾思想性和艺术性。二、选文尽量使用权威版本，特别是权威的整理本，不出校勘记，一般异文不作说明，重要异文在注释中加以说明。三、每种书正文前设“前言”，对入选的作者、作品及其他相关内容作较全面、精到的评介。四、作品及其注释按编年为序，不能编年的作品集中放在编年作品之后。五、每篇诗词正文下设“题解”和“注释”，题解根据具体情况对诗的写作背景、主旨、作法、艺术特色及涉及到的人名、地名、年号等方面做出介绍；注释则针对一般读者的切实需要，特别注意对典故、名物、典制等专有词和难懂语词的解释，生僻字加注汉语拼音，难懂的句子有串讲。

我们希望读者朋友通过阅读这套书，对中国文学史上优秀的诗词作家、作品能够有比较充分、系统的了解，在精神上产生共鸣，增加人生的兴味和体验；或者得到学习、仿效的榜样，有益于诗词的创作，那将是对我们莫大的鼓励。

最后，衷心感谢参与撰稿的专家学者，在这套丛书编撰的过程中，他们都竭尽全力，无私地做出了自己的奉献；其中几种选本所经历的艰辛，更远非心血二字可以概括。同时，希望读者朋友多提宝贵意见，以使这套书能在将来进一步得到完善。

中华书局编辑部

2004年9月

前言

韩愈、柳宗元是唐代成就卓著的散文大家，同时也是著名的诗人。

韩柳并称，固然是以散文的因素，他们在“文以明道”的明确理论指导下^①，以他们突出的才华和各异的风格，开启了一代散文新风，为中国散文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韩愈和柳宗元的诗歌创作，正处在中唐诗变的背景之中^②，他们在“中唐之再盛”（高棅《唐诗品汇·总叙》）的发展阶段中，皆能以不同的艺术风貌而

① 韩愈《争臣论》：“愈曰：君子居其位，则思死其官；未得位，则思修其辞以明其道，我将以明道也。”见《韩昌黎文集》卷二。又《题欧阳生哀辞后》：“愈之为古文，岂独取其句读不类于今者耶？思古人而不得见，学古道则欲兼通其辞；通其辞者，本志于古道者也。”见同上卷五。柳宗元《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云：“始吾幼且少，为文章，以辞为工。及长，乃知文者以明道，是固不苟为炳炳烺烺，务采色、夸声音而以为能也。凡吾所陈，皆自谓近道。”又《报崔黯秀才论为文书》云：“圣人之言，期以明道，学者务求诸道而遗其辞。辞之传于世者，必由于书。道假辞而明，辞假书而传，要之，之道而已耳。道之及，及乎物而已耳，斯取道之内者也。”均见《柳宗元集》卷三十四。

② 白居易《馀思未尽加为六韵重寄微之》：“制从长庆辞高古，诗到元和体变新。”见《白氏长庆集》卷二十三。清代叶燮《唐百家诗序》：“贞元、元和时，韩、柳、刘、钱、元、白凿险出奇，为古今诗运关键，后人称诗，胸无成识，谓为中唐，不知此中也者，乃古近百代之中，而非有唐之所独，后此千百年，无不从是以断。”

独树一帜。在后代诗论家的心目中，韩、柳皆为中唐诗坛中的巨擘，因而也常常被相提并论。例如：

唐代司空图云：“愚观文人之为诗，诗人之为文，始皆系其所尚，既专则搜研愈至，故能炫其工于不朽，亦犹力巨而斗者，所持之器各异，而皆能济胜以为勍敌也。愚尝览韩吏部歌诗数百首，其驱驾气势，若掀雷抉电，撑拄于天地之间，物状奇怪，不得不鼓舞而徇其呼吸也。……今于华下，方得柳诗，味其探搜之致，亦深远矣。俾其穷而克寿，抗精极思，则固非琐琐者轻可拟议其优劣。”（《题柳柳州集后》，见《司空表圣文集》卷二）

宋代苏轼云：“子厚诗在陶渊明下，韦苏州上，退之豪放奇险则过之，而温丽清深不及也。”（《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十九引）

胡仔云：“苕溪渔隐曰：古今诗人以诗名世者，或只一句，或只一联，或只一篇，虽其馀别有好诗，不专在此，然播传于后世，脍炙于人口者，终不出此矣。……若唐之李、杜、韩、柳，本朝之欧、王、苏、黄，清辞丽句，不可悉数，名与日月争光，不待摘句言之也。”（《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二）

姜夔云：“诗有出于《风》者，出于《雅》者。屈宋之文，《风》出也；韩柳之诗，《雅》出也；杜子美独能兼之。”（《白石道人诗说》）

赵孟坚云：“文章至唐而体备，其情态宛委，肌理丰泽，腴而密，婉而丽，斯亦世代至此而盛乎！故自贞元元和而上，李、杜、韩、柳以至乎长庆元、白，皆唐文之懿也。”（《凌愚谷诗集序》，见《彝斋文编》卷三）

明代瞿佑云：“唐诗前以李、杜，后以韩、柳为最，姚合而

下，君子不取焉。”（《归田诗话》）

陆时雍云：“读柳子厚诗，知其人无以偶；读韩昌黎诗，知其世莫能容。”（《诗镜总论》）

胡应麟云：“元和而后，诗道浸晚，而人才故自横绝一时。若昌黎之鸿伟，柳州之精工，梦得之雄奇，乐天之浩博，皆大家材具也。”（《诗薮》外编卷四）

清代叶矫然云：“韩、柳二家以诗论，韩具别才，柳却当家。韩之气魄奇矫，柳不能为；而雅淡幽峭，得骚人之致，则韩须让柳一席也。”（《龙性堂诗话》）

尽管这些论述角度不同，观点各异，但可以明显看出韩愈和柳宗元的诗歌创作在中唐诗坛上的突出地位。由于韩愈和柳宗元在出身、教养、思想、个性以及出处遭际等等方面的不同，这不仅直接影响到他们的散文创作，而且在诗歌创作的思想内容、审美情趣和艺术风格等方面，也有着十分深刻的影响。

韩愈（768—824），字退之，河南河阳（今河南孟县）人。郡望昌黎，世称韩昌黎。晚年任吏部侍郎，世又称韩吏部。卒后谥曰“文”，故后世又称韩文公。

韩愈的六世祖茂，仕北魏为尚书令、征南大将军，封安定桓王。到了唐代，韩氏家族也就开始衰微了。韩愈的祖父睿素，为桂州都督府长史；父仲卿，曾任武昌令，为官清廉正直，“惠如春风，三月大化；奸吏束手，豪宗侧目^①”，颇有美政；叔父云卿，任监察御史、礼部郎中，甚有文才，被李白誉为“文章冠世”（同上）。韩愈三岁丧父，得长兄韩会抚养。后随兄贬官远至岭南，兄死，随嫂

^① 李白《武昌宰韩君（仲卿）去思颂碑并序》，见《李太白全集》卷二十九。

郑氏北归河阳，后迁居江南宣城，一直过着颠沛困顿的生活。

韩愈二十岁赴长安应进士试，先后四次参加考试，直到德宗贞元八年（792）二十五岁时才登进士第。之后三次应吏部博学宏词试皆不入选，便先后赴汴州董晋、徐州张建封两节度使幕府任幕僚。贞元十七年（801），始选任国子监四门博士，十九年（803）迁监察御史。在监察御史任上，因上疏论天旱人饥状，被贬为阳山县令。顺宗永贞元年（805），大赦天下，韩愈离阳山赴郴州候命；八月，宪宗即位，韩愈再次遇赦，改任江陵府法曹参军。元和元年（806）六月以后，回长安任国子博士，分司东都，改都官员外郎，迁河南令，后又转任尚书比部郎中、史馆修撰、考功郎中、知制诰、太子右庶子、刑部侍郎、兵部侍郎等职。元和十四年（819），因谏佛骨事被贬为潮州刺史，年底改任袁州刺史。元和十五年（820）穆宗即位，召为国子祭酒，之后历任兵部侍郎，转吏部侍郎、京兆尹，兼御史大夫，复为吏部侍郎。穆宗长庆四年（824）十二月，卒于长安靖安里，享年五十七岁。

韩愈一生经历代宗、德宗、顺宗、宪宗、穆宗五朝，而主要活动在德宗贞元到宪宗元和时期。长达八年之久的安史之乱，不仅给广大中原地区带来深重灾难，而且李唐王朝的中央集权统治也由此一蹶不振。安史乱后的一段时期，历史上曾有过“中兴”的美誉，其实那不过是战火连年、民不聊生的大乱之后，得到暂时苟安的一种满足。尽管社会表面承平，但早已是败絮其中了。诸如宦官专权、藩镇跋扈、朋党倾轧、边患四起、朝政腐败等等问题皆已显露。韩愈生活在那样的时代，立身正直而又积极进取，颇能以匡补朝政和恢复儒道为己任，希望通过自己的言行来拯救世道人心。他在《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诗中说：“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正是他一生光

明磊落、勇于献身而又顽强不屈的真实自我写照。张籍在《祭退之》诗中说：“呜呼吏部公，其道诚巍昂。生为大贤姿，天使光我唐。德义动鬼神，鉴用不可详。独得雄直气，发为古文章。学无不该贯，吏治得其方。三次论诤退，其志亦刚强。”后来苏轼在《潮州韩文公庙碑》中更说他“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夺三军之帅”。都对韩愈的道德文章作了高度评价。

韩愈在文学方面除了“文起八代之衰”的卓越贡献之外，以他和孟郊为代表的韩孟诗派，以“不平则鸣”（韩愈《送孟东野序》）的创作态度和“笔补造化”（李贺《高轩过》）的艺术追求，共同创造出奇险峻刻的艺术风格。他们的诗歌艺术特征，不仅在中唐时期具有独创性，而且更具有“奇变”的色彩，同时又直接开启了“宋调”，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具有特殊的历史地位。而韩愈正是开此风气的关键性人物，例如清代学者叶燮在《原诗》中说：“唐诗为八代以来一大变，韩愈为唐诗之一大变，其力大，其思雄，崛起特为鼻祖。宋之苏（舜钦）、梅（尧臣）、欧（阳修）、苏（轼）、王（安石）、黄（庭坚），皆愈为之发其端，可谓极盛。”

韩愈今存诗歌四百首，总体来说，其所表现的思想内容，虽然不像他的散文那样直接关乎国计民生以及“道统”、“文统”等题旨宏大的问题，但其中也有不少作品表达他对于现实的关心、对国事的忧怀和对人民的同情。如其《古风》、《汴州乱二首》、《归彭城》、《永贞行》、《赴江陵途中寄赠王二十补阙李十一拾遗李二十六员外翰林三学士》、《泷吏》、《县斋有怀》、《丰陵行》等，对于现实都有真切而又深刻的反映。其《送灵师》、《送惠师》、《送僧澄观》、《华山女》、《谢自然诗》、《谁氏子》等作品，在排斥佛教和道教方面，也都显示出锐利的思想锋芒。然而韩愈更多的诗歌，

是表现怀才不遇、有志难伸、穷愁潦倒,或受到当政者的排挤、打击而产生的抑郁、悲慨和激愤之情,也就是他所说的“不平则鸣”。如《马厌谷》、《苦寒歌》、《知音者诚希》、《此日足可惜一首赠张籍》、《龊龊》、《忽忽》、《暮行河堤上》、《苦寒》、《同冠峡》、《县斋读书》、《八月十五日夜赠张功曹》、《谒衡岳庙遂宿岳寺题门楼》、《洞庭湖阻风赠张十一署》、《岳阳楼别窦司直》、《杏花》、《李花赠张十一署》、《秋怀诗十一首》、《东都遇春》、《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等,这类诗歌虽然是以抒发个人的失意牢骚为主,但个人的命运总是和国家、社会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韩愈还有一些诗歌,为身边怀才不遇的寒士鸣不平,对他们的种种遭遇寄寓深切的同情。如《孟生诗》、《答孟郊》、《荐士》、《重云一首李观疾赠之》、《雪后寄崔二十六丞公》、《嗟哉董生行》、《赠唐衢》、《寄卢仝》、《崔十六少府摄伊阳以诗及书见投因酬三十韵》、《送进士刘师服东归》等。韩愈这些鸣不平的诗作,强调不加限制地抒写“感激怨怒奇怪之辞”(《上宰相书》),光大了自屈原以来“发愤以抒情”的精神,突破了“温柔敦厚”的诗教传统,这是韩愈诗歌创新精神的实质所在^①。

韩愈十分重视心智、胆力和对物象的主观裁夺,他的《雨中寄孟刑部几道联句》云:“研文较幽玄,呼博骋雄快”,《咏雪赠张籍》云:“雕刻文刀利,搜求智网恢”,《答孟郊》云:“规模背时利,文字覩天巧”。研讨诗文而至于“幽玄”,搜求“智网”复辅以“雕刻”,造端命意、遣词造句则要力避流俗,覩寻“天巧”,足见韩愈的创作取向。韩愈还屡屡强调写作要“能自树立,不因循”(《答刘正夫

^① 参见孟二冬《韩孟诗传》,页 21,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3 年 2 月第一版。

书》),要大胆创新,“勇往无不敢”(《送无本师归范阳》)。他说:“若使乘酣骋雄怪,造化何以当镌劙!”(《酬司门卢四兄云夫院长望秋作》),这正象后来李贺所说的要“笔补造化”,向造化宣战。韩诗这种风格的形成,与其特富创新意识的诗歌理论以及中唐的文化趋向有着紧密的关联^①。

韩愈特别崇尚雄奇怪异之美。韩愈性格刚直,因屡受政治打击,促使他形成了一种怨愤郁躁、情激调变的审美取向。其《调张籍》云:“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想当施手时,巨刃磨天扬……我愿生两翅,捕逐出八荒。精神忽交通,百怪入我肠。刺手拔鲸牙,举瓢酌天浆。”此诗赞誉李杜诗“巨刃磨天扬”那奇特的语言、雄阔的气势和艺术手法的创新,并认为自己与李杜之“交通”处便是“百怪入我肠”,他欲追踪李杜,所取法也正在于此。所谓“拔鲸牙”、“酌天浆”,将其胆之大、力之猛、思之怪、境之奇发挥到极致,完全是一派天马行空、超越世俗的气象。

韩愈诗风向怪奇一路发展,大致始于贞元中后期,至元和中期已经定型。贞元、元和之际的阳山之贬,一方面是巨大的政治压力极大地加剧了韩愈的心理冲突,另一方面将荒僻险怪的南国景观推到诗人面前,二者交相作用,乃是造成韩愈诗风大变的重要条件。他在这一时期写的《宿龙宫滩》、《郴口又赠二首》、《龙移》、《岳阳楼别窦司直》、《八月十五夜赠张功曹》、《谒衡岳庙遂宿岳寺题门楼》等诗中,使用最多的是那些激荡、惊怖、幽险、凶怪的词语,诸如“激电”、“惊雷”、“怒涛”、“大波”,出没的“蛟龙”、悲号的“猩鼯”、森然可怖的“妖怪”、“鬼物”,一个个惊心动魄的

^① 参见孟二冬《韩孟诗派的创新意识及其与中唐文化趋向的关联》,《中国社会科学》1989年第6期。

意象辐凑笔端，极度描写了贬所的险恶和内心的惊恐，“数杯浇肠虽暂醉，皎皎万虑醒还新”（《感春四首》其四），长期的苦闷促使他搜罗奇语，雕镂词句，从而创造出前人未曾使用过的险怪意象。韩愈不仅把怪异雄奇的审美取向付诸创作实践，而且用以评价和赞许其他诗人的诗作。他说贾岛的诗是“狂词肆滂葩，低昂见舒惨。奸穷怪变得，往往造平淡”（《送无本师归范阳》）；说自己与孟郊、张籍等人的诗是“险语破鬼胆，高词媲皇坟”（《醉赠张秘书》），其着眼点都在力量的雄大、词语的险怪和造境的奇特。

韩愈的诗以长篇铺叙、随物赋形争胜，被后人称作“以文为诗”，他把经史百家都变成诗料，涵泳经史，烹割子集，开出奥衍典雅的一派。如《南山》诗全诗 102 韵，连用七联叠字句和 51 个带“或”字的诗句，穷形尽相地铺写终南山的高峻，四时景象的变幻。令人读来虽觉十分详尽，却又颇为繁琐。再如著名的《陆浑山火一首和皇甫湜用其韵》，巨细靡遗地描写了一场山火的强猛酷烈，创造出“山狂谷很”、“天跳地踔”等怪奇意象，呈现出光怪陆离、狰狞震荡的诗境。这种怪怪奇奇、戛戛独造的作风，正是韩愈在诗歌艺术上追求的目标。

韩愈还以散文化的章法、句法入诗，融叙述、议论为一体，写出了不少“既有诗之优美，复具文之流畅，韵散同体，诗文合一”的佳作^①。韩愈作为古文大家，他熟谙古文章法，常以散文笔调入诗，痛快畅达地叙事抒情，乃是其诗散文化形成的一个要因。如《山石》一诗，按照时间顺序，用不事雕琢、单行顺接的句子直书所历所见，把诗人的游踪在有条不紊的叙述中一一展现出来。全诗呈现出一种摆脱尘世牢笼的自由感，一种挣开格律束缚追求诗歌

^① 陈寅恪《金明馆丛稿初编·论韩愈》，三联书店 2001 年北京第 1 版。

原始美的主体精神充溢于字里行间，似散文，却又极富诗意。

韩愈还在诗中大量使用长短错落的散文句法，尽力消融诗与文的界限。五言诗如《谢自然诗》之“在纺织耕耘”，七言诗如《送区弘南归》之“嗟我道不能自肥”等，都有意拗峭句法，使语势、节奏滞涩不畅，与传统五言诗之上二下三型、七言诗之上四下三型节奏迥然不同，完全打破了诗歌圆转流利、和谐对称的特点，在形式上表现为新颖、生僻、怪奇，散文倾向也更为明显。

在以文入诗的同时，韩愈还无视古典诗歌重形象、重比兴、重趣味的传统，屡屡在诗中大发议论，直接表述对人生、社会的看法，形成了以议论入诗的特点。《荐士》、《醉赠张秘书》、《汴泗交流赠张仆射》等诗都穿插有议论，其《谢自然诗》“余闻古夏后”以下36句，几乎全是议论。这些议论，有的饱含忧怨，语义劲直，下笔不能自己；有的则纯属说教，用哲理取代了形象，读来枯燥无味。至如有的议论抒情色彩浓厚，且凝炼简洁，洒脱率放，足以振起全诗，自然是不可欠缺的。韩愈还和孟郊等人一起创作了不少联句诗，这些诗作以竞赛为主要目的，一联就是上百韵，各自逞奇炫怪，甚至用险韵以夸示才学，如《纳凉联句》、《城南联句》等。

韩愈诗歌的创作特点与他对于诗歌的认识有关。韩愈在《和席八十二韵》中说：“多情怀酒伴，除事作诗人。”认为诗歌不必要像文章那样“约六经之旨”、“扶树教道”，是可以资谈笑、助谐谑的。韩愈本人最爱谈笑谐谑，其《重答张籍书》：“昔者夫子犹有所戏，《诗》不云乎：‘善戏谑兮，不为虐兮’，《记》曰：‘张而不驰，文武不能也’，恶害于道哉？”韩愈的诗中有很多谈笑戏谑的游戏笔墨。如他形容鸟雀受冻难堪竟想到“不如弹射死，却得亲包燭”（《苦寒行》），吃个木耳也说成“烦君身入华阳洞，直割乖龙左耳来”（《答道士寄树鸡》），他的联句诗，甚至那些描写世俗、丑陋之

事之景的诗篇，那些自嘲式的写落齿、鼾睡的诗篇等，都可以看出他的风趣。

韩愈以宏大的胆气驾驭诗篇，赋予诗歌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和超现实色彩；他雕镂词句，尚险求奇，营造出大量他所独有的险怪意象；他以文入诗、以议论入诗，开一代诗风，这些无不展示出他在中唐诗坛所具有的独特地位。事实上，韩愈的“崛起”及其对唐诗的“大变”，不仅在当时影响巨大，而且对后世尤其是宋人的诗歌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柳宗元（773——819），字子厚，祖籍河东（今山西永济），世称柳河东；晚年贬任柳州，因又称柳柳州。

河东柳氏早在北朝就是著名的门阀士族，柳宗元曾在《故大理评事柳君墓志》中云：“柳族之分，在北为高。充于史氏，世相重侯。”唐王朝建立后，作为“关陇集团”的柳氏在新王朝中又取得了显赫的地位。但是经过武后朝统治集团内部激烈的斗争，柳氏便从皇亲贵戚的特权地位降落到一般官僚地主阶层之中。柳宗元曾在《送源序》中回顾道：“人咸言吾宗宜硕大，有积德焉。在高宗朝，并居尚书省二十二人。遭诸武，以故衰耗。武氏败，犹不能兴。为尚书吏者，间十数岁乃一人。”柳宗元祖父柳躬察任湖州德清令。父亲柳镇，明经登第，官至侍御史。柳宗元在《先侍御史府君神道表》称他“得《诗》之群，《书》之政，《易》之直、方、大，《春秋》之惩劝，以植于内而文于外，垂声当时。”他深明经书的学风和积极用世、刚正不阿的品格都对柳宗元有直接的影响。柳宗元的母亲出身于著名的范阳卢氏，有很好的文化素养，曾教授柳宗元背诵古赋十四首。柳宗元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

青年时期的柳宗元仕途很顺利，贞元九年（793），21岁的柳